

僞滿史叢書

漢奸秘聞錄

張輔麟



偽滿史叢書

漢奸秘聞錄

張
輔
麟



吉林教育出版社

伪满史丛书

汉奸秘闻录

张辅麟

责任编辑：任毅馥

封面设计：曲刚

出版：吉林教育出版社

787×1092毫米32开本9.5印张2插页192,000字

发行：吉林省新华书店

1990年12月第1版

1990年1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—4856册

定价：3.60元

印刷：吉林工学院印刷厂

ISBN 7-5383-1348-6/K·39

6077/24
17

开篇的话

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关东军用刺刀在中国东北制造了一个伪政权——“满洲国”。这出由日本侵略者牵线导演的政治傀儡戏，整整演了14年，主要演员除了末代皇帝溥仪之外，还有一群卖国求荣寡廉鲜耻的汉奸。他们以自己丑恶的表演，在中国东北现代历史舞台上留下了极不光彩的一幕。

近年来，随着“溥仪热”的出现，在我国无论书刊或电影，对于复辟派的卖国逆行，均从不同角度有所揭露，惟独对以张景惠之类的汉奸秽行，则不见有集中的鞭挞。有鉴于此，作者本着“历史几何学”的“狄德罗定理”：“为使德行显得更为可爱，恶行更为可憎，怪事更为触目”，根据搜集到的部分史实材料，对伪满后期汉奸集团主要成员28人，按其特点，分别加以勾勒。但愿这种漫画笔法，能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和卑污灵魂暴露于众，使人们从中认识到：写人，重在述事，不单纯追求个人责任。本书中所涉及的人，并非是单个的人，从历史发展规律角度看，是当时历史面貌人物化的表现；透过汉奸们的种种逆行，能更具体地了解东北那一段不幸的沦陷历史。同时，也可促使我们反思：鲁迅先生早就讽刺过的争做洋大人宠儿的“西崽相”（从伪满汉奸媚日来说，可算为“东崽相”），为什么至今在我们国家仍然没有消失

.....

这本书所展示的人物形象是丑恶的，丑在一些丧失了人格、人格的丑类，做了外国人的奴隶，却自以为得意，又象鲁迅先生说的：“从奴隶生活中寻出‘美’来，赞叹、抚摸、陶醉”，“怡然自乐地做敌人的鹰犬”，我在写作过程中，也感觉丑恶得难以著笔。然而我却希望这本书能化丑为美，在加强爱国主义教育，打掉民族自卑心理，弘扬中华民族正气上，能从反面起些作用，对人们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有所帮助。

最后还需要申明一点，本书所揭露的汉奸秽行，仅限于1945年8月以前。解放后，这些人在中国共产党改造政策的教育感召下，对自己的汉奸罪行有所认识，他们在抚顺战犯管理所接受审讯时，承认和交代了个人的罪行。50年代末和60年代初陆续特赦后，他们之中有些人继续清算过去的罪恶，并努力做好政府分配的工作，有改恶从善的实际行动，为人民做了点好事，但这已不是本书所涉及的范围了。

本书在写作过程中，曾得到中央档案馆国家处、辽宁省图书馆社会科学部、吉林省档案馆历史处的具体帮助。吉林省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的张恩惠同志、吉林省地方志编委会齐景山同志、吉林省社会科学院田禾、孙文范同志审阅了全书，吉林文史出版社毛振家同志也帮助审改了全部书稿。在此一并表示深深地谢意。

作 者

1989年12月于长春

目 录

【1】一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

——他说：为体现“日满一德一心”、支援“皇军”进行“圣战”，日本人“要啥给啥”。所以人们叫他“要啥给啥”的总理大臣。

【15】二 伪满参议府议长臧式毅

——他曾被关东军软禁过，后来他却当上伪奉天省长、伪民政部大臣，其中的奥秘在于他与板垣征四郎签了一纸卖身契。

【29】三 伪满宫内府大臣熙洽

——他一心想利用日本人恢复清室祖业，结果却成了关东军的傀儡，他虽是第一个敞开吉林城门揖让多门师团入城，后来却一直失宠失意。

【47】四 伪满司法部大臣张焕相

——作为东北元老出身的汉奸，他有两个不平常的举动：一是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抱着当“执政”的幻想，主动从北平返回东北，投进日寇怀抱；二是他首先在家乡修日本神社，供奉日本“神武天皇”，被日伪当局捧为“敬神家”。

【62】五 伪满交通部大臣谷次亨、文教部大臣卢元善、司法部大臣阎传绂、总务厅次长王贤伟

——他们是伪满汉奸集团中后起的实力派。人们说他们是关东州的“二等皇民”。

【79】六 伪满兴农部大臣黄富俊、哈尔滨市公署市长袁庆清、最高检察厅检察官徐良儒

——这三个不同出身、不同职务的汉奸，身为傀儡都体验了尴尬人做尴尬事的特殊滋味……

【98】七 伪满滨江省公署省长王子衡

——他在汉奸生涯中有一段沉浮，原来是他卷进石原莞尔与东条英机的矛盾漩涡中……

【108】八 伪满监察院院长于冲汉、经济部大臣于静远

——这一对父子，父传子、子继父，全都效力于日本帝国主义，可谓“卖国世家”。

【123】九 伪满交通部大臣阮振铎、四平省公署省长曲秉善

——这两个弃医从政的汉奸，在媚日卖国上十分有术。

【140】十 伪满尚书府大臣吉兴、厚生部大臣金名世

——他们和溥仪同宗，都是爱新觉罗家族，也曾抱有复辟的幻想，但却一直受到重用，原因在于他们很识“时务”，甘心认关东军为主子。

【160】十一 伪满勤劳部大臣于镜涛

——他在伪满汉奸中被公认为“活得很”的人物。伪满洲国垮台前夕，他还当了几天代理“国务总理”大臣。

【178】十二 伪满首都警察厅总监齐知政

——人们都叫他“虎皮总监”。为什么呢？这里面

有一段他与伪首都防卫司令官、“围剿”杨靖宇将军的刽子手野副昌德交往的故事。

【194】十三 伪满驻泰国公使王庆璋

——这是一个神秘人物，官位不算大，能量却不小。原来他是一个特务，在孤岛上海与宪兵司令官三浦勾结，干了许多坏事。

【210】十四 伪满第一军管区司令官王之佑

——他曾是吉林抗日自卫军的前敌总指挥，投降日寇后，成了关东军剿杀抗日力量的“一把刀”，他得到了什么呢？不过是一个空头的上将司令官。

【225】十五 伪满第九军管区司令官甘珠尔扎布、伪第十军管区参谋长正珠尔扎布

——这一对兄弟是“宗社党”人巴布扎布的后裔，由日本浪人川岛浪速培养成人。甘珠尔扎布虽被川岛芳子视为无能而离弃，但他以后却因组织“甘支队”而名噪一时；正珠尔扎布不仅当过特务，还在“诺门坎事件”中立了功。

【239】十六 伪满第十军管区司令官郭文林

——他是蒙古族军官，与凌升关系密切，既受溥仪“恩宠”，又得关东军信任，是一个到处吃得开的人物。

【251】十七 伪满宫内府侍从武官长张海鹏

——这个老军阀，在“江桥事件”和“热河事变”中，两次充当关东军的马前走卒。

【268】十八 伪满第四军管区司令官李文龙

——他虽是个武夫，却深谙为官、升官之道，为此他算尽了机关……

【281】十九 伪满军事部参谋司司长佟衡

——这是一个在伪军中起关键作用的特殊人物，他不仅帮助日本军事顾问佐佐木到一完成了对伪军的“改造计划”，更肩负特殊使命，与南京派遣军参谋副长落合相勾结，渗入汪伪军事当局干了许多阴谋勾当。

一 伪满国务总理大臣张景惠

——他说：为体现“日满一德一心”，支援“皇军”进行“圣战”，日本人“要啥给啥”。所以人们叫他“要啥给啥”的总理大臣。

1935年5月19日，在伪满国务院发生了一件极不寻常的事情：当晚8时各伪大臣被召集来到总务长官官邸开会，却不告知会议内容。只见会场内外日本宪兵出出入入，门口还有武装宪兵把守，如临大敌。可是届时并不召开大会，大臣们一个个被单兵“教练”，召到密室，个别宣告国务院改组及本人被调动的事项。就是在这样一片紧张而神秘的气氛中，张景惠取代“建国老臣”郑孝胥，当上了“国务总理大臣”。从1935年5月到1945年8月，张景惠在总理大臣位上整整干了10年。这期间关东军为便于操纵，对身居伪满军政要职的汉奸，频频进行调动，有人竟被调动达4、5次之多，惟独张景惠稳居“总理大臣”宝座安然不动。据与张景惠关系密切的于镜涛说，关东军曾向张景惠保证：让他终身坐稳“满洲国”的第二把交椅（第一把交椅自然是伪皇帝溥仪，他不能“僭越”）。伪大臣们背地里说，张景惠是“铁杆总理大臣”。

张景惠所以地位稳固，一是由于日寇殖民统治需要他这

样的傀儡；二是他本人媚敌卖国有术，二者结合，铸成了他这“第二把交椅”的坚实基础。对于日本在“满洲国”进行殖民统治的指导思想，在一次日本高级军官集会上，伪军政部最高顾问佐佐木到一在发言中，坦露得十分彻底，他说：“我们（日本人）不要只着意于防止他们（中国人）的反抗意识，而要会使用他们给我们服务”（重点号系作者所加）。张景惠的所作所为，正是日本殖民统治者这一指导思想的具体写照。

1. 他对关东军奉行“要啥给啥”主义

早在“九·一八”事变之初，发动事变的魁首本庄繁和土肥原在11月7日致日皇裕仁的电报中，就曾表示对张景惠有兴趣，他们评价张景惠：“在满洲有一定声望，但毫无学问，人既颀硕，又无大志远谋，手下尽阿谀之辈，全无人材之可言，臣等为我帝国一贯政策速达目的计，必使此等人物为图利用可也。”伪总务厅次长古海忠之后来回忆说，选中张景惠出任总理大臣，是因为“张景惠是伪满政界的元老，投降派的巨头之一，擅于得人和，是个‘好好先生’。”张景惠的这些表现，在关东军看来是最合适不过的傀儡总理大臣人选。所以当关东军决定把越来越不大听话的、还十分热衷于“国际共管”的郑孝胥，从“总理大臣”位置上拿下来，自然要把张景惠扶上去，并且一直不变，直至伪满政权覆灭。张景惠也真不辜负关东军对他的信任与器重，他当“总理大臣”10年的“政绩”，可用他自己的一句口头禅来概括：“要啥给啥”。张景惠说到做到，竟使这句口头禅成了他做总理大臣一贯奉行

的“主义”了。随着日本对外侵略战争的扩大，军需补给线的加长，物资匮乏日益突出，张景惠的这个“要啥给啥”主义，对日本帝国主义越来越有价值。

本来，日本军国主义者一直把中国东北作为扩大侵略战争的“后方基地”。“七·七”事变以后，它加紧实施掠夺计划；太平洋战争爆发后，日本对中国东北的掠夺更加疯狂，张景惠便成了日寇得心应手的“供给部长”。

第一项，张景惠积极推行“粮谷出荷”，大肆征收粮食，数目逐年增加。1940年征粮720万吨，到1945年增加到950万吨；直接运往日本国内的粮食，1940年为200万吨，到1945年为500万吨。这种逐年增加的趋势，自然是日本帝国主义掠夺本性所决定的，也同张景惠的“要啥给啥”的主张有关。他为了向日本主子显示忠心，不仅到处倡导“要啥给啥”，还主张多给、给足、给够。就拿1943年来说，伪总务长官武部六藏原定“粮谷出荷”的计划量是720万吨，张景惠却说：“今年年景不错，可望丰收，出荷的数量一定要增加一些。”总理大臣发了话，正合武部六藏的心意，因此这年的“出荷”量增加了30万吨，共计750万吨。在张景惠来说，只是动动嘴，向日本人讨个好，可是，这30万吨粮的背后，不知包含着东北广大农民多少血和泪！它是从农民嘴里抠出的口粮，是从农民手中夺来的籽种，真可谓是敲骨吸髓。农民被逼得走投无路，群起而拒交。各省县为完成任务，只好层层组织“出荷”督励班，下乡搜刮逼索。林甸就曾发生农民因拒交“出荷”粮，被日本人副县长殴打致伤、住房和柴草被烧的严重事件。这些事，在伪国务院和伪省长会议上也引起纷纷议

论。张景惠见关东军参谋长饭村穰和第四课长黑川大佐在座，怕他们听到这些议论后恼怒，便突然站起来，拍着桌子吼叫训斥说：“不用往下说了，他妈的，不管是谁，不出荷的，就拉出来给我毙了！”一向和气的“好好先生”突然发这么大的脾气，这种反常之举，闹得众大臣不知所措，一时怔在那里，不敢吱声。

日本侵略者和伪满统治者拼命加大“出荷”量，就必然要不断压低人们的口粮。张景惠通过他管辖的伪国务院这架机器，先后炮制了《主要粮谷统制法》、《农产物交易市场法》、《粮谷管理法》等一系列反动法令，严格控制群众的口粮，配给量之低，是举世罕见的。1943年7月，在当时的奉天，大人供给量为7公斤，少年为4公斤，幼儿2公斤；鞍山市成人供给6公斤半，抚顺才供给6公斤；哈尔滨的供给量更少得可怜，4月份成人仅配给5公斤，5月份5.5公斤，6月因另给点白面，只供给2.5公斤粮。这点粮让人真难以糊口了。黑市虽然也有粮食卖，但谁要买粮，要冒着被打成“经济犯”的风险，一旦被警察抓住，轻则被打一顿，粮食被没收；重则被拘押判刑，一家老小受牵连。再说黑市交易的粮价奇高，听了让人咋舌：黑市一斤苞米价是配给价的5倍；高粮米配给价是一斤1角钱，黑市价一斤是1.3元钱，高出12倍。老百姓是不敢问津的。他们只好吃用橡子面蒸的“满洲馒头”，喝豆饼渣掺糠粃杂谷煮的“协和粥”。就这样，关东军第四课长小尾还说：“日本每家都有出征的，牺牲的也不少，和日本一德一心的‘满洲国’人吃得少一点，多出二成粮谷不算什么。”张景惠马上接着说：“我是庄稼人出身，明白庄稼地里

的事情，这样大的‘满洲国’，哪有因粮食不足而饿死人的道理”，“勒紧裤带也就过去了”。总理大臣在上面大嘴一咧发号令，下面的小汉奸狗腿子也真就勒上了，有的地方干脆一粒粮也不配给。1943年7月，伪北安省完全停止了粮食配给；伪牡丹江省有6 620名老弱妇幼被长期停粮。老百姓说，这何止是勒裤带，是让我们扎脖子。人不吃粮，哪还有活路，不少人由此走上绝路，仅1942年1至5月，在双城、佳木斯等5市县就有346人因无粮可吃被迫自杀。张景惠对此无动于衷，不闻不问。相反，他为了讨好日寇，1945年4月，在美机轰炸东京、日本面临本土决战的情况下，他竟以慰问特使身份亲赴日本东京，送去30万吨大米，70万担盐，并在铃木首相举行的欢迎宴会上一再表示说：“满洲物资丰富，有力量援助亲邦进行‘圣战’。”

第二项，张景惠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钢铁的需要，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进行征搜。当时，日本帝国主义又发动了太平洋战争，为了与美国争夺制空权和制海权，倾泻了大量钢铁。几次大海战，日本不少舰只被击沉，成百架的飞机被击毁。日本是个资源贫乏的国家，国内不产钢铁，它所需的军用物资便转嫁到中国东北，而且随着战局的发展，需求量越来越多，要求越来越急。于是，张景惠主持的“国务院”制定了《金属类回收法》，将群众手中的各种金属制品悉数搜去，象门拉手，吃饭用的汤匙等，也都列入收缴的范围，点心模子、乐谱架子、炉箆子……，不论物品大小，凡沾上金属边的，统统列在《金属类回收法》的清单中，连老太太平时嘴叨的铜烟袋锅也是回收对象。当时报纸曾大吹大擂，专门报道，

说德都县为响应张“国务总理大臣”献纳金属的号召，专门举行仪式，将187尊明朝以来铸就的大铜佛全部献了出来，“协力圣战”。当下人们议论纷纷，说铜佛如有知，也会叱骂以张景惠为首的汉奸集团的媚日罪行。当时由于张景惠的鼓动，全“满洲国”一时刮起献纳金属的旋风，连伪皇帝溥仪也不得不装模作样拿出一些金属制品，甚至还动员他身边的子侄们“献纳”。张景惠自然更是表示“以身作则”了，他令伪国务院将办公楼门窗上的铜拉手全部卸下来，连伪国务院大门口颇有些威势的大铜吊灯也摘了下来，献纳出去，门口立时显得光秃秃的，人们走过那里，自然议论说：张“总理”为博得日本人满意，顾不上“摆谱”，连门面都不要了。经过这么一番折腾，还真解决了日本军需金属物资的燃眉之急。1944年，古海忠之去上海采办日本军需品时，一次就从东北运出20吨铜。对张景惠的“忠心”，日本人怎能不欣赏呢！

第三项，为满足日本帝国主义对钱的需要，张景惠也不含糊。仅通过伪满税收一项收入，就为关东军聚敛了十分可观的经费了。1932年伪满刚成立，全东北税收为1.7亿元伪币。张景惠上台执政后，巧立名目，拼命向人民征税。据清原县太平川村一位伪甲长回忆，他经手收的税，就有土地税、人头税、畜牲税、车轮税等。此外，还征收各种费，什么保甲费、协和会费、门户费、天照大神供奉费、狗牌子费，连养鸡、鸭、猪等也全都上税，经这位甲长初步折算一下，在当时，一般老百姓平均一年得拿300多斤粮食的杂税。1937年，伪满税收为3亿元（含专卖收入），1944年度增到11亿元（含专卖收入）。

第四项，张景惠帮助日本要地。日本侵略者的本质是掠夺成性的。为了制造向外侵略的舆论，它们叫嚷说日本的“国土狭小”，影响发展，要争取生存空间，以此作为其向外扩张的理论根据。曾任陆军大臣的荒木贞夫就公开宣扬：“日本的命运就在于发展它的空间”。军国主义分子要发展的“空间”，按其“大陆政策”的既定步骤，除朝鲜外，首当其冲的是中国东北，他们要把空间从日本列岛延长到中国大陆。“九·一八”事变后，日本出版的地图中，有的就把中国东北和日本本土列岛涂上同一颜色。按照他们的逻辑，向中国东北移民乃是天经地义之事。等张景惠上台执政二年，关东军认为已全面确立对东北的殖民统治秩序后，1937年夏，由关东军司令官兼驻满全权大使植田谦吉和张景惠共同签订了《满洲拓殖会社协定》，依此“协定”，日本国以20年为期，将向“满洲国”移民20万户，100万人。为了移民，自然要先占地，自1937年后，有1650万公顷土地被占用（含山林荒地），其中有1200万垧良田。仅此，就逼得40700余户农民无立锥之地，只好背井离乡，到处流浪。

再一项，就是掠夺中国的劳动力，让东北人民无偿地为关东军服劳役，叫做“出劳工”。当时，老百姓普遍认为，谁去了“劳工”，谁就登上了望乡台，去时容易回来难，活着回来的人屈指可数。开始征用劳工是去修煤矿和水电站；后来，关东军搞什么“北部振兴计划”，大修军事工程，要征用大量的劳工。只要日本主子一发话，张景惠无不加以满足。还是经过他的手，制定了《国民勤劳奉公法》，规定凡18岁到45岁的男子，都有当劳工的“义务”。一时间从省到市县，由市县

到区乡，层层摊派出劳工，谁要不从，就捕捉处罚。关东军每年所需劳工最少是50万，有时竟达百万。1942年，为了落实关东军“特别大演习”计划，临时紧急征用劳工240万。这么多的人一时难以征到，光天化日之下就在大城市抓“浮浪”，把一些上街办事或闲散市民，当作扰乱社会秩序的“浮浪”抓去，押运到东部或西部边境，修建军事工程。这些人那里每天平均要干十二三小时的活，有时多达十五六个小时；他们住在阴暗潮湿的工棚子里或者地窖子里，由于不得温饱，加上传染病流行，死亡率极高。一些地方因死人过多，就把死人垛成垛，成车往外拉，拉到“万人坑”去集体埋掉。这种惨绝人寰的奴役，引起民众的愤恨，怨气沸腾。关东军听说后找张景惠，他却说：“满洲人苦力有的是，要多少，有多少，你们不要顾虑……”有张总理大臣的慨然应允，日本人更加猖狂，也大喊大叫说：“满洲人大大的有，死了的，没关系。”自此，东北凡修工厂、矿山和各军事要塞，就要捕抓大批劳工，又死亡大批劳工，到处白骨累累，“万人坑”触目皆是，成为张景惠“要啥给啥”主义的罪证。

正是在张景惠“要啥给啥”的主张下，助长了日本帝国主义掠夺中国东北的疯狂性。据有关方面统计，从1933年到1944年，日本从东北掠走煤炭21 661万吨，铁11 83万吨；从1935年到1944年，掠夺钢、钢片988.6万吨，钢材319.6万吨。这些数字，对当时中国东北的生产能力来说，已经是近乎天文数字那样可观了。

张景惠，这位铁杆亲日派汉奸，为了满足日本帝国主义的需要，不仅出卖祖国的各种资源、财富和人力，还出卖祖